

“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程相占

2012年6月13—14日,“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行。本次会议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研究中心、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及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芬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八个国家与地区的七十余名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

首先应该提及的是本次会议的形式。会议手册在醒目的位置标明了“会议准则”：“生态平等、学术至上”——与会学者无论长幼全部参与大会发言,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一律15分钟;会议取消了国内学术会议一般都难以免除的开幕式,把“穿靴戴帽”的时间节省出来用于大会发言;会议的最后一部分共两个小时是自由讨论,会议代表围绕着前两天的发言展开了此起彼伏的自由交锋。这些形式都体现了会议所倡导的生态精神。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6篇,共有53位代表先后做了大会发言。现根据大会发言的具体情况,分五个方面对本次会议进行综合介绍。

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意识与中外传统哲学

以德里达、福柯等哲学家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旨在“解构”现代性哲学的局限和错误,但其极端的一面则完全消解了现代性的合理性。如果说“解构”主要是“破”的话,以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大卫·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则主张“破中有立”,也就是主张“建设”或“建构”——与“解构”一词相对应的 constructive 一词,也可以翻译成“建构性”。格里芬教授这次发言的题目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否有助于克服生态危机?》,他首先概述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日渐严峻的生态危机,如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海平面上升等。他提出,在美国流行的虚无主义和超自然主义两种世界观,使美国人对地球正在我们周围坍塌这一事实漠不关心。格里芬提出,以怀特海哲学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这两种世界观。与虚无主义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像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哲学一样,认为宇宙体现着内在的道德和审美原则,比如为下一代照看好世界;与超自然主义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相信神圣实在。由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坚持这两个信念,他们将以一种适宜的生活模式来保持人性应被看作是神圣的这一职责。格里芬教授特别提出,中国受到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特海)的启发,能够帮助挽救文明;而美国则被财阀和军事力量严重控制,所以他对美国将引领世界走向一种后现代世界不抱希望。他指出,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实现生态文明,中国只要遵循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处方,就能够有助于在总体上挽救很多自然世界,特别是有助于挽救人类文明。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的发言所关注的核心是“第二次启蒙与东方精神”。他指出,过于强烈的光亮不仅使眼睛迷乱,也会吞噬掉一切自行显示者,制造出比幽暗更普遍的黑暗。启蒙理性的悲剧也正在这里。“第二次启蒙”重在“开启‘启蒙之蒙’”,昭示为启蒙理性障蔽的诸多方面的问题。相对于第一次启蒙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

第二次启蒙努力的方向则是“人与自然签约”，即整合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关系，克服现代人的无根浮萍状态。在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前现代社会历史演替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自然主义哲学传统中的生存智慧，将成为建设后现代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后现代如何对待前现代，西方如何看待东方，事关地球人类今后的前途和命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杨富斌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略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观及其启示》，他指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观以怀特海的整体有机论哲学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敬畏自然，尊重大地，按照自然的规律来改造和利用自然物，为人类的共同福祉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理地使用和改造自然物。我国在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注重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合理思想，努力防止或避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犯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努力走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

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朴商焕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与有机体哲学》，他认为：有机体哲学包含着人和社会问题，有机体哲学的现代问题意识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有关联，与传统中国哲学的联系是从李约瑟开始的。他试图通过对尼采和莱布尼茨的独特解释，重新审视有机体哲学的意义以及东西哲学史中有机体哲学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通过对阴阳的解释深入分析《周易》所包含的有机体哲学思想。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李飞博士的发言探讨了《周易正义》的自然观。他指出，在易学史上，王弼首先将老庄的自然概念引入到《周易》的诠释中来，但在王弼的易学体系并不占重要的位置。孔颖达《周易正义》始以自然概念对周易的重要思想加以统摄和改造，以王弼义理派为主调和了王弼与汉易象数学的对立，使自然思想成为《正义》易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正义》的自然思想虽以王弼为主，但却同时融合了汉儒（包括王充）以至郭象的自然理论，是对老子以来的自然思想的整合和杂拌。以此，《正义》的自然呈现出多种特性，而与传统的天人关系中的天观念之内涵

颇为接近。《正义》屡屡以自然、人事对扬,在某些叙述中甚至专门以自然指称非生命系统。现代汉语中狭义的自然指自然界、大自然,与人类活动相对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古代汉语的自然无此意义,但近代以来何故以“自然”一词翻译具有“自然界”意涵的 Nature,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偶然。从本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正义》的自然虽然主要是一表示形态、性质的抽象名词,但这一名词所表明的形态、性质,却与现代汉语的自然界一词的内涵有相通之处。

二、中外传统生态审美智慧、生态美学与身体美学

生态美学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引起的关注和讨论都是空前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曾繁仁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建设性的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的重放光彩》,他首先指出,宗白华提出的“中国古代美学的大放光彩”这一愿望,可以在当前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下得以实现,因为后现代实际上是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而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则给予生态文化以特别的关注,比如,大卫·雷·格里芬提出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生态的,并提出“生态论的存在观”。其次,他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阴阳相生”哲学思维的特殊内涵与理论背景,认为二者所包含的“敬畏自然”、人与自然的紧密相关性与“生生为易”的生命论,其实也就是一种古典形态的东方生态哲学思维。第三,他分析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相生”中和之美的内涵,包括保合太和乃利贞的风调雨顺之美,元亨利贞的“四德”的吉祥安康之美,天地氤氲、万物化生的生命之美,“易者像也”的借助自然现象的绿色思维。曾繁仁还分析了“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中和之美”在艺术中的表现:比如民间艺术中表现了一种生态的生存的意蕴,绘画艺术中的“气韵生动”,音乐中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建筑中的“法天象地”与“阴阳相生”,诗学中“风雅颂赋比兴六义”所体现的生态审美智慧,君子修养的“天地境界”等几个方面。最后,他还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中和之美”的当代价

值。他认为,建设性后现代的特点是从古代文化,特别是轴心时期的文化中通过“知识考古学”挖掘出新的思想资源以补正现代文化,西方德里达、福柯与德勒兹等都是这样做的。由此,可以想到从中国古代轴心时期即先秦时期也能发掘出有价值的内涵,包括“天人合一”、“阴阳相生”与“中和之美”、“气韵生动”等生态的生命的哲学与美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这样做的具体途径有两个,首先是与西方美学对话,发掘其不同于西方古代和谐论美学的特有内涵,以及与西方当代环境美学在来源与内涵上的重要差异;其次是与当代中国美学特别是实践美学的对话,补正其“人化自然”中人类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补正自己的前现代思想的种种弊端,走向新的历史阶段。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的发言题目是《第二次启蒙与生态美学》。他首先指出,现代社会对美和自然美的压制与放逐基本上是压倒一切的主旋律,而第一次启蒙的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农民的蔑视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立场,对科学和理性的盲目崇拜以及支撑这一切的现代机械哲学世界观,才是美和自然美遭到罢黜命运的根本原因所在。第一次启蒙的上述内在局限及其对美和自然美的冷落和打压,不仅对于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审美危机难辞其咎,而且对于今日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启蒙”,或曰第二次启蒙。第二次启蒙是一种后现代启蒙,在根底上它是一种生态启蒙,美的启蒙,因此,高扬生态意识和审美智慧就成为第二次启蒙的两个核心特征和重要理论内容。第二次启蒙与生态美学具有深度的契合性。不仅第二次启蒙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弃为生态美学的出场扫清了障碍,而且第二次启蒙的生态意识也为生态美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此外,第二次启蒙所呼唤的审美智慧和审美感激本身也可以看作是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构成。反过来说,生态美学也丰富了第二次启蒙的理论内容。中国发展生态美学的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无疑为第二次启蒙和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在文化层面,与西方根深蒂固的强调

人与自然相分离的传统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走着“一条天人亲和的路子”。生态美不仅帮助我们带着感激的心情,用爱的目光、敬畏的眼神看待自然,而且也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同情心和幸福感;此外,生态美学更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现代消费主义,捍卫精神的尊严;最后,在现实层面,生态美学对消解当代中国的城乡对立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现实意义。

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综合科学研究科青木孝夫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朦胧美学——气象和身心之交流的美学》。他认为,美的体验作为感性的体验,身体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自然环境是以身体作为核心被体验的。对我们来说,包含夜晚、雨和雾等等消极情形下的气象美学,并不是伴随气象学的知识以及气象美的经验来审美的,而是以夜晚的气象氛围作为经验的背景,对风和香味等身心机能做出的反应的情形更为重要。把身心作为核心的自然环境之审美经验,并不是观赏风景的一种经验,而是进入环境、与环境交流的重要性的叙述。他借鉴国际著名环境美学家伯林特和卡尔森的相关理论资源,尝试着从东亚的传统出发来捕捉自然和身心之交流中的审美体验。

上海政法学院国学研究所祁志祥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庄子“适性为美”思想的生态美学意义》。他认为,当代生态美学呼唤生态美,不过对生态美的本质尚缺少丰富系统的阐释。而两千多年前由庄子提出的“适性为美”思想则对认识生态美的本质、建构生态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代生态美学的基本要义,几乎都暗含在庄子的“适性为美”思想中,值得人们深入挖掘。

德国美学协会前主席社会学教授赫尔曼·普胥茨(Hermann Pfütze)先生的发言题目是《美·关照·对抗》。他指出,人们对于生态美学的第一个观点是:它是新的、好的和美的。它不同于其他的美学领域,如化妆品和广告;也不同于那些关注经济增长和政治权力的美学形态。生态美学可以从自然美和艺术美(用康德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划分)方面来描述。在关于美的这一经验之外,生态美学不同于自然美和艺术美。但跟它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当生态美学不是在被强迫,而是当经济、政治(和宗教)

忽略、不干涉它之时,它和自然、艺术一样都充满创造性。人们对于生态美学的第二个观点是:生态和可持续发展这一事业表明人们对人类生活状况在全球范围内遭受破坏的严肃关照。生态美学的实质就是对我们蓝色星球的关照。简单地说回到自然状态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地球污染已经变成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们无忧无虑的生活梦想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成就、健康或是社会政策的问题,而是生态意识的问题。人们对于生态美学的第三个观点是:其他的美学主要是以装饰、图标、商标或纪念碑等来掩盖或补偿真实世界破坏性或丑陋的一面。而生态美学与它们不同,它以非破坏性的审美对抗概念来反对破坏和自我破坏。通常,与政治抗议、经济斗争和意识形态相比,审美对抗既弱小又强大。它从根本上是人性间共通的、普遍的。它的特殊形态可以被毁灭,但它永远不会消失。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李庆本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欣赏自然的三种模式:艺术、环境与生态》,他指出,加拿大环境美学家总结了自然欣赏的艺术模式与环境模式,而生态美学模式则是在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自然欣赏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其世界观是生态人文主义的,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是积极参与的体验性交互方式而不是以既定模式来消极感受自然;感知方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而不是纯感性的;感受对象不仅是一个固定的对象,而且是自然过程与流变。生态模式是对艺术模式与环境模式的超越。

美国汉德里克斯学院杰伊·麦克丹尼尔(Jay McDaniel)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生态美学——中国之希望、世界之希望》。他提出,生态美学不仅是一种艺术哲学,而且是一种对生命的态度,它存在于对生命和环境的一种尊重感之中,存在于一种想要与周围的世界和谐共存的渴望之中。生态美学的和谐并非千篇一律,其和谐具有一种其自身的平衡感。人类生命是历史性的,自然界亦是历史性的。人类历史发生于而非脱离于更大的自然界的史。未来在各个层次上都是开放的。生态美学的目的在于帮助个体找到生命中的完满,帮助他们构建和谐社会。可持续性社区的出现要求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文明的基本假设,需要转向一种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

式,批评孤立的个人主义和否认生命的集体主义,强调事件而非物质是生命的基本构筑材料。但最重要的是,可持续性社区的出现亦要求培养一种新的敏感性,一种对生命的态度,其中,尊重生命和环境占据首要地位。当中国远离科学至上主义和消费主义、恢复并更新它自己过去的智慧时,便能够并应该在帮助人类听见那种呼唤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是中国在 21 世纪的启蒙中的作用。

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施特凡·马耶夏克(Stefan Majetschak)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对“美的”自然的智性兴趣——康德的生态美学视角》,他提出,一般来说,对可以给予“美”的体验的自然的呵护与关注,必须由富有智性的人类承担,而这成为生态美学命题确立的一个哲学前提。他试图阐明,除其他理论资源之外,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同样能与生态美学的这一哲学前提建立理论上的关联。在该著作的第 42 段,康德以“关于美的智性兴趣”为题所作的思考,也可以成为当今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点。康德在此指出,美的自然之审美体验不仅能激起对美的自然物形式的愉悦之情,同时也会唤起人们对自然本身的兴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凭借智性的力量,自然美可被诠释为自然与人类理论、实践的世界定向形式之根本亲和关系的印证。通过上述思考他尝试揭示,康德在将生态美学论点引入哲学领域上起了先导作用。

德国莱比锡大学汉学院王卓斐博士的发言题目是《伯姆的生态自然美学观》。她指出,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德国美学学者积极介入了对近现代以来主体论自然美学传统的反思与修正工作。其中,格尔诺特·伯姆提出的“生态自然美学观”被公认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理论。作为在当代环境保护运动背景下诞生的一种新型的自然美学形态,生态自然美学从普通感性学的立场出发,以身体感知为基点,探讨自然环境与人的感觉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以此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与协调统一。通过对其理论实质和“身体”、“气氛”两个关键概念的分析,她试图揭示:生态自然美学将以往研究中少有关注的环境对象在感觉活动中的呈现特征和其间感知者自我经验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置

于理论的前台,并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西方传统自然美学中物我、身心的对立与冲突,呈现出生态与人文交融的新气象。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比较文学约翰·西克尔(John van Sickle)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后现代史诗语境下的生态美学——德里克·沃尔科特Omeros中的重建记忆》,他指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其长诗 *Omeros* (1990) 中力图调解各种紧张关系:生态批评、生态女权主义、后殖民意识、深度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资源保护主义等。沃尔科特重拾史诗传统以阐释并修复历史上有名的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掠夺、使岛民们背井离乡、对岛上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以及地方环境的恶化等,殖民开发把该地区变成了人类后现代危机的试验基地。沃尔科特将人类的冒险精神和本性生态体系紧密交织在一起,通过两个人物为我们打开生态批评和后殖民视阈。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龙迪勇研究员提交的论文是《试论生态思想中的“田园主义”》,该文认为,“生态学”关注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两种,前者主要指的是乡村,而后者主要指的是城市。在生态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乡村”这一空间形态是其主要的思想基点或思考重心。正是这种偏重“乡村”(自然)的思想姿态,造成了生态思想中“田园主义”思潮的长期流行。生态思想中的“田园主义”思潮始于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一书;而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则表明“田园主义”由“乡村”向“城市”的渗透,并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田园主义”——“都市田园主义”的诞生。无论是哪种“田园主义”,它们都是一种基于“乡村”的生态思想,这种思想无法很好地解决“城市”中的生态问题。要真正解决“城市”中的生态问题,就必须让思想回归到“城市”本身。

襄樊学院美术学院罗祖文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试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所蕴涵的生态审美智慧》。他提出,中国传统建筑“象法宇宙”,是为了与天地建立起同构对应关系,实现天、地、人三者和谐共生的审美诉求;它融于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浑然天成;它以“中”为轴,以“和”为审

美指归,致力于实现伦理秩序的和谐;它以木为结构,以门窗为界口,追求生命之气与自然之气的交流。

济南大学文学院赵玉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道家与儒家:生态整体观的两种不同构筑路径》,她认为,虽然道、儒两家都把现实的物质世界看成是一个血脉相连的有机整体,并从而具有了生态学意义,但二者在构筑生态整体观念时所走的逻辑路线却截然相反:道家首先立足于宏观的“道”,走的是由整体到个体的逻辑路线,即“道→阴阳→自然万物(包括人)”;儒家则首先立足于微观的人类个体,走的则是由个体到整体的逻辑路线,即“个人→家→国→天下”。道家从宇宙本体论出发,主要着眼于物质世界本身的演化过程;儒家则从人类伦理学出发,注重的是人类个体的伦理修为过程,并最终实现伦理观念的本体化。但不论道家还是儒家,在这种貌似主观猜测的逻辑推理背后,都包含着某种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观念相契合的深刻内涵。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程相占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他试图参照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美学来界定、发展生态美学,提出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艺术审美”的“环境审美”,它是对于自黑格尔以来、以艺术品为研究中心的“艺术哲学”的批判超越,其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的区别与联系;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审美”,它的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地审美”。他认为,生态审美包括四个要点:(一)彻底摒弃那种基于人与世界对立、主一客二分的传统审美模式,代之以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审美交融”模式。(二)生态审美是以生态伦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审美活动,是对于传统美学理论中审美与伦理关系的生态改造与强化,生态意识是生态审美的必要前提条件。(三)生态审美必须借助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生态学知识引起好奇心和联想,进而激发想象和情感,没有基本的生态知识就无法进行生态审美。(四)指导生态审美的两条生态价值准则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必须克服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人类审美偏好”,反思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天性和习性。

生态美学与身体美学具有什么样的关联?有三位学者涉及这个问题。第一个是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刘毅青教授的发言《庄子技艺观的生态美学内涵——以徐复观的阐释为中心》,他认为,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对中国绘画艺术史的阐释是以庄子美学为中心展开的,而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生态美学理论,其生态美学理论又是建立在庄子独特的身体观中的。庄子的这一身体观连接着其技艺观。徐复观对庄子“技进于道”的阐释是构建其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他从身心观的角度切入对中国艺术精神如何通于道的境界。他对技艺和技术做了分梳,指出,庄子从身心统一的思想阐释了技艺能进于道,而技术则不能。技艺通过身体与心有密切的联系,技艺需要身体的功夫实现艺术的创造。身心一致,心的修养就是身心合一的过程,身与心距离的消解过程。而技术则恰恰相反,它会加速身心的分离。“虚静”、“心斋”、“坐忘”实际上就是通过身心两忘达到身心的合一,是对生理欲望与理性的知见的双重超越。可以说,这所达到的既是道的境界,也正是艺术最高的审美境界。作者的结论是:借由技艺的修养历程启发人的内省性以实现道的境界,这种道近乎技是一种实践智慧,代表了中国文化在修养美学上的成就,对当代的生态美学具有启发意义,能够丰富我们对生态美学的理解,深化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王茜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盘古神话的现象学阐释》,她主要使用现象学理论对盘古神话进行重新阐释,认为盘古神话是对人类身体经验与世界彼此关联的原初生存世界的想象性表达。人通过身体经验在原本陌生外在的空间中筹划出一个有内在意义、可供栖居的世界,世界一方面是身体经验建构而成,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性与先在性,是安置生命的基础。盘古神话的现代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重新信任身体直觉,尊重具有超越性的自然世界,反思理性的有限性,向包含有自然身体经验的鲜活文化源头回归。

《中国民间歌谣中的身体意识》是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曹成竹博士的发言题目,他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中国的民间歌谣中充斥着大量与“身体”相关的主题和内容,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肉欲狂欢的民间,一个大

胆奔放的民间,同时也是一个荒诞淫乱、缺乏规约的民间。我们应该用辩证的态度思考这类歌谣的存在价值:一方面它们作为自然人性的艺术呈现,用固有的身体逻辑表达了对封建正统道德秩序的嘲讽和解构;另一方面这类歌谣长久以来始终以边缘和潜在的状态存在着,而且类似于作为意淫手段的精神胜利法,因此又可以看作禁锢身体的文化体制的附属品。只有在社会文化转型期,当歌谣演绎者之外的文化精英群体作为旁观者开始注意它们、凝视它们、谈论它们,把它们置于自身语境之外的時候,民间歌谣中的身体意识才被激活——作为一种表达抵抗意识的民间审美习俗,它们的积极意义从底层文化、边缘文化中被提炼出来,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审美经验植入到新兴文化的构型之中。

浙江科技学院语言文学学院中文系王彦章、于云两位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生态美学视阈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他们认为,从生态美学视阈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极大的盲目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质是日常生活休闲化。“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美学界以及整个文化界引起剧烈的争论,症结在于对审美概念的误用。审美是休闲的最高层次,日常生活休闲化是当下现实,而断言日常生活已经审美化为时尚早。坚持休闲的审美指向,不断把日常生活休闲化提升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在生态美学领域的意义所在。

山东大学文学院吴承笃博士的发言题目是《栖居与生态——“诗意栖居”的生态意蕴解读》,他提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深层病因在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家园的沦丧。贯穿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栖居理论对人的本真存在和家园意识有着独特的见解。真正的栖居将人的存在置于天地人神的四重整体之中,呵护人与万物回归其本己的自由。通过对“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的阐释,海德格尔指出了人类向存在家园的复归之途,为生态存在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日本广岛大学客员研究员臧新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他指出,从环境美学衍生的“生态美学论”,经过近二十年的讨

论、研究,在探索中不断深化,取得了世界美学界的广泛认可和非常瞩目的成绩。以前美学研究的前沿总是以欧美美学界为主导的式样在渐渐瓦解,尽管欧美研究“环境美学”的学者不乏其人,但“生态美学论”在中国的兴起,区别了“环境”与“生态”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内涵与意义。在中国的学术氛围感染下,欧美日韩的学者们也随着中国生态美学的节拍,同时展开了相应的研究。

三、过程哲学与生态美学研究

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是数学家、逻辑学家 A. N. 怀特海,不少学者试图发掘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美学意蕴及其对生态美学的启示。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樊美筠博士的发言《怀特海过程美学及其生态意蕴》认为,怀特海的“过程美学”或曰“有机美学”一直是我国过程思想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她认为,怀特海的美学理论其实是极为丰富的,因为可以说他的整个哲学、整个形而上学都是美学;怀特海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审美经验是普遍的、美是动态的和谐、美是道德的基础、高扬美的重要性等几方面。她将怀特海美学的生态意蕴归纳为如下几点:通过消除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为生态运动提供了本体论的支撑;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对美的放逐,呼唤一种对美充满热望的生态文明;为生态伦理学奠定了基础;丰富了生态美学等。

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过程视野看作为后现代理论和实践的生态美学》,他认为,美学向后现代范式的转变彻底改变了美学的理论和实践,消解了来自现代主义的诸多偏见。他把美学理解为追求美的实践和对该实践的反思。生态美学需要从现代主义转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生态美学是融合理智与感情的最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之一。因为生态学是一门科学,提供了有关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的大量资料。但是,因为生态系统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存以及我们的核心价值,它也包括它自身。只有后现代的各

种理论才能恰当地解释这种复杂的整合。他借鉴了著名的过程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以及孔子、当代环境主义者和当代西方美学家的一些观点,提出“生态美学”这个术语要求我们在美和价值统一的基础上来看待自然。最后,他以环境主义者约翰·穆尔和珍古道尔为例,更加具体地说明生态美学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引用杜甫、威廉姆·布莱克和陶潜的诗句来唤起理智与感情的统一,试图超越单纯的理性或者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强乃社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过程的空间分析》。他指出,过程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但是在一些研究中,过程概念的解释侧重时间性,对其空间性挖掘不足,可能影响了这种研究的深度,比如,后现代和过程哲学在什么地方能够结合起来,在什么地方能够防止后现代性被理解为一种解构性的思想,这种建构也不是现代性条件下一种强调时间性的建构,而是一种强调空间性的建构。这是读图时代、赛博空间时代、去深度时代或者说浅表时代的一种内在需要。这对我们的审美也有重要影响。怀特海在他的《过程和实在》一书中关于过程的空间性问题给我们启发。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盖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过程—关系性思维与生态审美体验》,他认为,过程哲学就是要努力清楚而深刻地思考一个显然的真理:我们的世界和生命都是动态的、相互关联的过程。过程性、关联(关系)性及有机性作为过程哲学的支撑概念与生态研究异曲同工。生态是有机性存在,而有机性既是过程性与关系性的,也呈现价值体验性。审美基于生命有机体的活动,且经由过程及关系而成就人的价值体验。生态条件下处于活力无穷的生命有机性,是过程性、关系性存在,但须得自于生命存在的多样性及共生性,由此成就的价值体验及审美活动亦需多样性与共生性的条件。关系性的生态存在的多样性、多重性及复杂性,直接助推着生命活动的有机性及复杂性,进而促成人的多重生存关系的有机与和谐;过程性的生态表现协同作用,使人不断地向自我、自由的人生成,且成就人的生态有机结构,即表现人是与对象世界(自然、社会、人)生态共生的结构体,是理智性、精神性且能动地观照体验并活化以“生态”

为基础的生存结构。生态审美作为环绕人的这种过程性、关系性的生命体验,从多重关系的自由及有机性置入,演历人们对生命个体到社会、自然有机性的体悟过程。我们对生态审美的学理研究,不仅要实际操作有机性、非线性状况,并且须对过程性给予深层解读及美学体验。

四、环境运动、环境美学、环境设计与环境教育

全球环境运动(environmental movement)和生态运动(ecology movement)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二者侧重点不同但具有紧密联系。伴随着这两个运动所产生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也具有难分难解的关系:西方学者一般在环境美学的框架内理解和发展生态美学,将生态美学视为环境美学的一部分,甚至认为二者就是一回事;而中国学者则倾向于从生态文明的总体框架内理解和发展生态美学,认为生态美学是生态文明的一部分;它借鉴了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但与环境美学又具有根本差别。本次会议有一些发言涉及环境美学与建设问题。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盖尔·莱文(Gail Levin)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美国视觉文化和环境运动的开端》,她指出,当代许多艺术家都致力于环境恢复工程,努力使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回到更为平衡的状态。她着重论述了那些曾帮助人们提高对环境危机的认识以及以个人身份号召人们行动起来的美术家。人们对环境破坏的担忧首先表现为对原子弹发明的恐惧。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几位艺术家开始围绕这一危险性进行创作,1965年,艾伦·森菲斯特首次提出艺术的一项全新的用途——将曼哈顿城中的一块空地变为专门种植原生植物的森林,就像它们生长在尚未有人类介入的地方一样。尽管直到1978年他的计划才得以实现,但他却很早就预见到了环境恢复运动。莱文把这些艺术家与所谓的“大地艺术家”进行对比,认为后者的侧重点在于审美而非生态系统的福祉;另外,她还探讨了环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重点考察了那些活跃在生态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女艺术家。

从广义上说,环境美学是环境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望衡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试论农业审美愿景——新农村建设与环境美学》,他提出,渔猎、农业、工业是人类历时并共时存在着的三种主要的生产方式,相应,自然界、农村和城市是人类历时并共时存在的三种主要的生活环境。目前的城市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按城市的模式改造农村,实际上是消灭农村。这种做法体现了工业社会的发展需求,然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出现,实际上正在将社会推向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已有向农村回归的趋势。农业生产本来更切合人性,而农村也本具有宜居和乐居的优势。这种优势,在落后的生产力的条件是低层次的,但借助了工业社会高科技的优势和后工业社会新的农业观念,它有可能发展到新的水平。未来的农村将成为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未来的农业应让人类更幸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娜塔莉·布朗(Nathalie Blanc)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环境美学能否包含对变化的叙述?》。她认为,环境美学是一股发端于英美的哲学思潮,在法国也得到了发展。它试图重新审视人类建立与环境的关系的方式。由于人们通常采取一种科学或技术的视角,这些关系在文化视角(即一定人类群体的一系列惯例和价值代表)下很少为人所知。她反思了环境美学及其表现的两种再现方式的冲突。一种是对环境的视觉化的、静止不变的再现;而另一种再现为相互联系的日常生活事件预留了位置,这些事件通过永不停止的姿态和价值的叙述、生成而形成。

南开大学哲学院薛富兴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艾伦·卡尔松论功能确定与转化问题》,旨在探讨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他指出,艾伦·卡尔松在新著《功能之美》中提出了功能不确定性问题与功能转化问题。他拓展了“选择效果理论”用以解决前者,提倡“功能之美现象学”解决后者。本文认为:自然对象根本不存在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因为自然对象所有现存之有效功能均为恰当功能。对于人造对象而言,卡尔松新版本的“选择效果理论”仅能部分地解决问题,需重新围绕特性、语境与意图三段分别建立不同方案以解决之。对于功能转化问题,卡尔松仅总结了功能

之美的数种特征,并未从认识论角度真正解决此问题。正面提出审美直觉观念很可能是解决功能转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悦笛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融入“生活美学”的当代“环境美学”》,他认为,在后分析美学的语境当中,作为当代全球美学的两个最新思潮——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形成了互动的紧密关联。一方面,环境美学实现了从“自然环境美学”到“人类环境美学”的重要转变;另一方面,“生活美学”的生成也从“艺术界”转到“生活界”。当我们确认环境是“作为生活”的环境的时候,环境美学的发展就展露出三个崭新的方向:1.环境美学的“应用化”:从理论到“应用”的环境美学;2.环境美学的“生态化”:从生物论到“文化生态学”的美学;3.环境美学的“社会化”: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的美学。环境美学家们正在形成某种共识,当他们将环境美学融入生活美学之时,都将“审美化的生活”当作了环境发展的深层尺度。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刘辛民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认知“间联性”与认知的间联性:从中国庭园艺术的东学西渐谈起》。他重新发掘了18世纪英国文人对中国士大夫庭园艺术的借鉴和论争,聚焦东方庭园艺术移植英伦三岛之过程中触及的社会功用性(social utility);从中披露“如画学说”(the picturesque)为西人鉴赏自然和界定人与自然关系奠定主要基石;以此揭示认知自然本身规律及本质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间联性”(interrelatedness);厘清人与自然实为诸多主体之间的互相认知,需以平等共生为圭臬而求人类与物界的和谐同存。

环境美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也就是说,它与环境设计和建设密不可分。本次会议有三个发言涉及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建平教授的《为什么要克服“千城一面”》。他认为,在大规模城市化的今天,城市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也迫切需要从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他从“千城一面”的焦虑谈起,说明那种克服“千城一面”的努力,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艺术的追求。巴西的巴西利亚城是这种追求的一个实例。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地标,这个城市实现了“全设计”,将城

市作为一件艺术品来对待。城市设计可以是一门艺术,但并不一定要“全设计”。许多城市是自然生长的,即使设计,也只是起到“路线图”一样的作用,即对城市的生长进行引导。城市常常依山水之势而建,借用其风水和风景,从而使城市风光与自然风光结合起来。城市有着城市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由历史赋予,也可以由文学和艺术赋予。但讲述城市故事时,需要历史与现实的平衡,旅游与生活的平衡。城市不是对象,不能只是用游客的心态来建城。在建设中需要有一种主人的精神和家园的感觉。他最后力图深化“家园感”的命题,提出只有融入到城市的活态生活之中,使城市里的人对城市产生认同和归属感,城市才有生命,也才有真正的城市之美。

第二个是山东大学陈炎教授,他的发言《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大学校园》通过丰富的图片试图说明,无论是从经济基础还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分析,有着最佳节约目标和功能取向的现代建筑必然成为当代中国大学校园的主要选择。然而,在工具理性和经济效益的引导下,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又会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失去特有的个性色彩和文化内涵。于是,如何在建设以现代建筑为主体的大学校园的同时,适度引进古典建筑尤其是后现代建筑的美学元素,便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艺术使命。在这一探索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二元对立”和“适度统一”的两种模式值得我们反思。

第三个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祁嘉华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城市的生态学思考》,认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对城市环境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重建城市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与传统的城市建设理论比较,生态学思想更加看重利用科技手段系统地研究和整体地处理城市问题,保持城市人口和环境的和谐相处。绿色的自然环境和鲜明的人文色彩是城市生态环境的基本构成,也是评价城市生态环境好坏的基本指标。本着这一原则,他提出了城市资源有限、资源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体潜能开发的思想,以解决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困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环境教育是一个日益紧迫的话题。东芬兰大学约·瑟帕玛(Yrjö

Sepänmaa)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对环境的文明态度——文化、教育、启蒙和智慧》,他提出,文化与文明态度,启蒙与智慧,这些都与环境密切相关,而环境也与它们相关。对环境采取一种文明态度,是一种自觉而充满感情的技巧或意愿,它为我们提供一种基本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方式。文明态度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导向,它至关重要。它意味着,给予正确的行为以适当的尊重和赞赏,并向往更美好的追求。至少有两种环境文明态度和启蒙。一种是环境知识,它通过自然和文化科学、教养,通过观察和系统学习而获得;另外一种积极态度:恭敬的行为方式,关心和同情。依恋,基于知识的爱和尊敬,都会鼓励保护和关心。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健康与福祉,完全取决于物质环境 and 精神环境的福祉。人与环境处于相互支撑和依靠的互动关系中,这种互动的关联普遍存在。人类的存在与否,对地球的正常运转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如果地球没有人类,在很多方面会比以前更好。然而,地球上很多重要的东西将随着人类的消亡而消失。就像地球也必将在某一个时刻终结一样,人类也会消亡。但是,如果这种消亡是由人类造成的,这将意味着生命丰富性在一个时期内的锐减。

五、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

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具有密切联系的是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所以这两个论题也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王诺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处所理论与生态文学》。他首先辨析了西方生态批评家们非常关注的“place”一词的汉译问题,认为将之翻译为“地方”、“场所”都不如翻译成“处所”更恰当。他认为,处所概念与空间(space)概念不同,主要从人与特定自然区域的关系之角度思考人的生存、人的异化和人的生态身份确认,不能体现人与自然的联系、不能确定和标记人的生态存在和生态身份的特定空间就是“非处所”。重视处所并长期在特定处所里生活创作,这在美国和西方生态作家那里是有传统的;但是,日趋全球化的当代文明是一种越来越非处所的文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不包括生

态城市)和消费文化,不仅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处所——或逼迫人们进入非生态的城市生活,或污染糟蹋了人们童年或者祖先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处所,而且还使得那些较少受到文明污染的乡野居民越来越自卑、没有自信,越来越向往非生态、非处所的城市生活。他结合国内著名生态诗人阿红、红豆的作品,探讨了处所与生态的身份认同、处所想象等问题,最后总结了处所理论的贡献与局限,认为处所理论为生态批评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处所理论还有很大的进一步提升或完善的空间。

无独有偶,台湾淡江大学英语系黄逸民副教授也探讨了处所(场所)理论。他的发言题目是《后现代空间中的荒野》,首先介绍了劳伦斯·贝尔(Lawrence Buell)、乌淑拉·海瑟(Ursula Heise)和朱利安·墨菲特(Julian Murphet)等人的场所(place)与空间理论,然后着眼于提摩太·摩顿(Timothy Morton)的新书《生态思维》所提及的概念而提出特殊空间概念,认为地方的“在此”(here)总已是“在别处”(elsewhere)。他引述了三首台湾作家的诗,阐释这三首诗如何激起后现代空间/地方美学中对于荒野的再形塑,提醒读者关注后现代荒野之神秘怪异的他者性。

清华大学外文系宋丽丽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美国环境文学与生态批评反思》。她认为,生态批评源自人文学界生态意识与环境责任意识的觉醒,蕴含一股强烈对现代性的反思力量。在对自然写作、环境文学、浪漫主义文学以及超越自然写作的经典作品的反思性研究中,美国生态批评的批评视阈在不断扩大,批评方法也呈现出多元跨学科的样态。生态批评方法论更多地呈发散状态发展,那么各流派所论述和反思的内容是否也是发散性的呢?她认为并非如此。她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中心主义、机械主义自然观、科技至上的文明观、个人主义价值观、权力中心、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人文主义伦理观九个方面,对生态批评究竟反思什么进行了整合式的思考,从而使得环境文学的教学、阅读与写作更加有的放矢。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蓓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关于中国生态批评文本分析策略的思考》。她认为,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在过去十余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发展中也遇到了文本体裁和题材视野不够宽广、批评方

法不够多样并缺乏特色等问题。在研究中国生态批评文本分析策略时,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以生态主义的认识,建构一个环境文本框架,重视人的环境性,认识到一切文本中都显示出环境与人的相互影响;认识到文本的文化语境也包括环境对人类历史的积极参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石海毓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生态批评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契合》。她指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对自然生态保护的迫切需要成为今天人类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情况催生了生态文学。生态文学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它试图挖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即造成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从而唤醒和增强读者的生态意识,促使人们进行文明反思,进而对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实现人类诗意地栖居做出贡献。它批判人类剥削、压榨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倡生态整体主义,倡导所有生命生来平等,主张多样性和共生性的原则,这些都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超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建立一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后现代意识;倡导多元的思维风格,倡导对世界的关心爱护,这些主张使得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又打上了生态的印记。生态文学研究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契合使得二者可以共同引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晓明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评析生态批评的后现代视角》。他也认为,当代生态批评所遵循的生态整体观和建设性后现代精神相契合,二者都重视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和谐共存。那些融合后现代视角的生态批评将自身生态思考与后现代思想方法相结合,反思割裂人与自然的狭隘自然观,倡导一种包含生态整体意识、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构想。同时,当代生态批评还拥有一种宽阔的多元文化视野,重视吸收不同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资源。

山东大学文学院赵奎英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生态语言学与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文学、文化研究》,她提出,由于自觉的生态文化研究是在

西方后现代语境中兴起的,而“后现代”无论是从现实状况还是从理论观念上看都是以高度符号化、语言化为标志的。这使得在后现代语境中研究生态文学、文化,语言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大卫·格里芬的生态性后现代科学还是生态批评,他们虽然都敏锐地意识到某些语言观念对生态文化致命的危害性,但尚未找到一种能够为生态文学、文化理论提供全面支持的语言理论作为语言哲学基础。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态语言学则为突破这种困境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生态语言学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方法也十分多样,但不管是哪种范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都以认同生态学原则,以认同语言与环境、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前提。这使它既超越了西方传统语言观单方面强调世界对于语言的先在性、决定性作用,也超越了结构—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单方面强调语言的建构作用和优先地位,否定语言与外界关系的局限性,是一种真正辩证的、生态的语言学理论,对当今的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的语言哲学基础建构具有重要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张生珍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生物区域主义、学术研究和实践主义——迈克尔·P. 布兰奇文学批评观探析》,她指出,当代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布兰奇关注生物地域主义、学术研究及实践主义等几个关键课题。在这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许多生态批评家都非常重视与本地景观的联系。布兰奇指出了日渐全球化背景下本地意识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地域主义中对“家”这个概念的理解如何区别于“住处”这个概念,同时还对学术研究与环境实践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评论。布兰奇教授重视生物地域意识和生物地域实践如何与环境研究和环境实践相结合,特别是生物地域主义原则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促进本地环境实践主义的发展。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罗宾·威瑟(Robin Visser)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新儒学综合——1980年代中国环境文学分析》,她讨论了三部从宗教和传统的多样性出发批判非可持续发展行为的中国小说。她认为,阿城1985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树王》是“文革”时期最早表

现出生态意识的作品之一,1989年,高行健在小说《灵山》中详细说明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系统的生态实践,并探讨了道家和万物有灵论者的思想;姜戎在他2004年的小说《狼图腾》中,通过对内蒙古额伦草原的牧人的描写表达了他对生态问题的警告。促使她进行这项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向人们灌输人类属于环境的意识和将人类孤立起来,哪种选择可能为我们人类带来更多好处。通过培养人们对与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拥有触觉联系的这种意识,现代人能否基于“自身”利益停止破坏性发展的行为?她对中国当代几个影响较大的生态文学作品的分析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们广泛地认识到非人类中心传统将存在表述为所属,或者是德里达所谓的“与……一起存在”,可能反过来扩大我们感知中的实用行动的范围。她认为,中国生态美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的复兴不仅仅是历史的遗产,还具有战略意义。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王惠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自觉的生态文学与自发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概念辨析》。她认为,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出现在中国不过短短数年光景;但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在中国的历史几乎和文学的历史一样绵长。然而,生态文学概念的界定却把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生态文学资源抛却在视野之外,由此带来了生态文学范围狭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生态文学主题先行,其艺术性难以体现;否定中国传统文学的当代价值和生态价值;生态文学和与其一体两面的生态批评难以同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现有的生态文学概念只是生态文学之一种,可以名之为自觉的生态文学。此外,还有大量的自发的生态文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生态文学。

的确存在着王惠所说的“自发的生态文学”。有两位学者的发言涉及这个问题。第一位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初清华讨论了她目前正在研究的“气象文学”。她提出,与中医理论同样是以中国古代“气”论哲学为基础的“气象文学”,烙有中国古代先民的自然观与思维模式的印记,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随着魏晋时期主体意识的觉醒,国人的自然观与思维模式由“天人合一”向“人定胜天”发展,呈现

出题材上以天气现象为主向季候为主,体裁上由神话、寓言发展为诗词歌赋等更为丰富的样式的阶段性变化。面对现代大学教育分科体制及科学意识的冲击,中国现代“气象文学”创作与研究终究被剔除精神内涵,空余形式与技巧的部分偶有表现。如今,过于关注探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而日趋狭隘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若要有所突破,传承以人和自然关系为思考重心的中国古代“气象文学”是重要途径,强化“气象文学”的创作研究也是传承中国文化的必然要求。

第二位是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杨昇博士。他与王旭烽教授合作的论文《隐居与出塞: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与诗歌艺术风格变迁内在关联浅析——以岑参为例》提出,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门类,塞外风物及生态环境的剧变,往往导致诗歌书写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巨大变化。他们以唐诗人岑参的相关作品为切入视角,将诗人早年隐居时的诗歌与他作于塞外诗歌的艺术风格进行比较,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揭示文学作品产生背景及其对文学创作的触发机理,探究生态环境变化对文学创作艺术风格的内在影响及其外在表现,力图进一步构建文学与自然的生态性关联。

北京外国语大学耿晓谕博士提交的论文是《斯奈德诗歌的生态意义》,该文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应是和谐的,然而人口膨胀及经济发展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生态环境在急剧恶化。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加里·斯奈德始终关注着生态环境的变化。他的作品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紧张的对峙关系,同时提出了解决当前困境的方法。斯奈德认为,世界由无数个相联系的“他者”组成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口数量的剧增和人类欲望的过度膨胀,自然正在失去它的本来面目。他呼吁人们保护自然,与自然合而为一。

本次会议还有代表提到其他问题。比如,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徐国源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重新部落化——论麦克卢汉的媒介平衡观》,他提出,在麦克卢汉的诸多论说中,学界多留意他的媒介是“讯息”、“人体的延伸”和“冷”、“热”媒介的经典表述,但较少涉及其“媒介平衡”理论。其

实,麦克卢汉站在时代哲学的高度,早就先见之明地指出:人类对于传媒环境的变化具有适应能力,“电子革命将恢复人的感官平衡”,并且他把这个历史进程称为“重新部落化”。以上论述,对于理解当今网络时代的文化状况仍有启示意义。

会议还吸引了生态环保运动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女士的参加。她通过实地考察拍下了反映中国生态变迁、环境恶化的大量照片,并呼吁学术研究者能够真正付诸行动,为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